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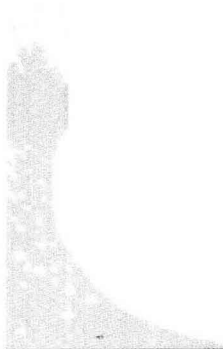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人物文集系列

经元善集

虞和平 编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人物文集系列

经元善集

虞和平 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元善集/虞和平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人物文集系列)

ISBN 978-7-5622-5129-3

I. ①经… II. ①虞… III. ①经元善(1840~1903)—文集

IV. ①Z4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6211 号

经 元 善 集

编者:虞和平 ①

责任编辑:张建英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25.25

字数:385 千字

插页:4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7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 20 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 1920 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30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1978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编者说明

一、本集资料选自经元善所编著之《居易初集》（包括光绪辛丑澳门版两卷本和光绪壬寅七月上海同文社版三卷本）、《女学集议初编》、《趋庭记述》及其主持修订的《古虞驿亭经氏宗谱》；《上海协赈公所往来信稿》（抄本）、谢维威编《谢氏家藏同、光诸老尺牋》；《申报》、《知新报》、《中国旬报》、《万国公报》、《时务报》等古籍、报刊。

二、集主经元善，系 19 世纪下半叶江浙绅商的领袖人物，在洋务企业、社会改良、民办义赈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本集汇录了有关经氏的经济、政治、教育、公益、救灾、宗教等活动和思想的主要论述和函电，可供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史、教育史、妇运史、社会史之用；对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民间救灾历史的研究，尤有参考价值。

三、本集除收录经氏亲作件之外，还选辑若干与之密切相关的他人评论、记述、函电附于有关原件之下。有些无明确署名而又不能确定是否出自经氏之手的篇章，也附于相关原作之下。这些篇后附录，有的系经氏原作所附者，有的系编者酌情附入。

四、集末附录《居易初集》的《序》和《跋》、《时人评论〈居易初集〉》，以供研究者参考。编者所撰《经元善年表》，亦充作附录之一，以方便读者研究。

五、本集之编辑以经氏自编之《居易初集》和《女学集议初编》为基准，其中有些曾在报刊上发表过的篇章，凡能见及者均作校对，改动较大者则全文附录；删略者均加 [] 标明；局部修改者均标码脚注。

六、本集各件之编排，以时间为序。原作未署时日者，经考证置于相应之处；难于考证而发表于当时报刊者，按发表日期编排；有年月无日期者，置于月末。题下和文末出处所标日期均系阳历，作者行文中均用阴历，一仍其旧。

七、本集各件，一律注明出处、作者。凡未注出处和作者之件，均出自《居易初集》；凡原件作者不明确者，均由编者略作考证说明。

八、本集各件基本采用原有标题。偶有原无标题者，则根据内容酌加，以*注明。有些续刊同类篇章而原标题不一者，则由编者划一之。

九、本集各件均由编者标点，或予分段，并作校勘。作者原注，以（ ）标明；错字加〔 〕订正；脱字加〈 〉补入；残缺或难认之文字，用□标出；少数确属明显错字，则直接改正。

十、本集因限于客观条件，不能毕集经氏所有撰著函电。有关档案资料未能收集；有些关于赈灾活动的资料，因限于篇幅也没有编入。由于编者水平，错讹失当之处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十一、本集的整理工作，得到导师章开沅先生的鼓励、指导，并得到了经氏后裔经广洮、经广炽、经尊义的惠助；华东师范大学黄逸平先生，华中师范大学唐文权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元高、熊月之，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杰等同志，都给予了热情的帮助；上海图书馆、苏州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为编者搜集有关资料提供了方便；浙江省上虞县人民政府提供了部分出版资助。对于上述机构和个人，编者谨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前 言

经元善（1841—1903），字莲山（或莲珊），原籍浙江上虞，出身于上层绅商之家，先后从事过义务赈灾、洋务企业、社会改良等活动。他的一生经过了从旧式商人到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从洋务企业商董到资本主义改良活动家的转变，体现了时代的脉搏。对经元善的所作所为，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蔡元培曾在1902年作过这样的评论：“呜呼，世变亟矣！吾国承词章选士之弊，言行相缪已成结习。今者，风气诚不开，民智诚不进，而开之通之者，仅仅恃言论之力，结习所限，其效果及言论之风潮而止。是非得慥慥怪怪，言信行果之士，律度而仪表之，决不足以振吾国。以吾所见，如上虞经君莲山者，庶者人欤。”^①然而，这样一个注重言行一致、富有实干精神的早期资本主义改良实践家，只为前人所颂，罕为今人所知。

本集辑录了经元善生平之主要言行，如果能对19世纪下半叶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踪迹略有所陈；如果能对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历史渊源有所反映；如果能对经元善这一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的故人还其原有的历史地位，那也就达到了本集的出版目的。

经家世以耕读为业，至经元善父亲，才因贫于1818年赴上海

^① 《居易初集·蔡序》（增订本），光绪壬寅（1902年）七月上海版。

学商。1840年后，随着上海开埠通商而逐渐致富，且因长于社交，热心善举，经家广结朝臣、疆吏和绅商，名闻沪上。经元善自幼迁居上海，年十七即学贾，追随父亲左右，深受家庭熏陶，广识各界人士。1865年其父去世后，家族所有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几乎都由经元善以长子的身份继承：当年承袭“知府”头衔；次年接任上海同仁辅元堂董事；1871年继承“仁元钱庄”。从此，经元善在其父亲为之打下的基础上开始创造自己的业绩。

1877年冬开始的义赈活动，可谓是经元善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他从报上获悉河南奇灾，恻隐之心不禁怦怦而动，与友人李麟策及上海果育堂首董瞿世人商议，决定募捐救济豫灾，开办义赈。次年2月，又和李麟策及旅沪同乡绅商屠云峰等数人，创立“上海公济同人会”^①，专办豫赈，由仁元钱庄代收捐款，然后交果育堂汇兑解往灾区。3月，瞿世仁病故，上海义赈同人一致推举经元善代替果育堂负责收解赈款之事。4月，上海义赈绅商开会集议陕西义赈问题，又一致公推经元善“总司后路赈务”^②，全面负责赈款收解事务。经元善认为，劝捐救灾，责无旁贷，遂集全力于赈务，频频撰文劝人捐款，屡屡修书敦友募捐，认真亲司赈款收解。更有进者，为着一志筹赈，毅然将世业仁元钱庄停歇，以其地设立上海“协赈公所”^③，作为组织上海绅商进行义赈活动的常务机构。从此经元善在实际上成为上海绅商义赈活动的领袖，他在上海的社会地位顿时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由民间自设机构，领导一方民众进行义赈活动的方式，不仅在上海未曾有过，而且在全国亦属首倡。它的出现，使义赈活动增强了组织性和计划性，克服了某些弊端，也扩大了义赈的规模和作用。虽然在经元善从事义赈活动之前，已有少数江浙绅商和民间慈善团体在进行这项活动，但是这只是个别绅商的一种临时性的私人慈善活动，赈灾的对象也只限于原籍和邻近地区。而经元善领导的协赈公所的义赈活动，则已成为江浙绅商的一项联合的社会公益活动。他们每开辟一个赈区，总是先派人带少量

① 《申报》，1878年2月26日。

② 《居易初集》第2卷，光绪辛丑（1901年）仲夏澳门版，第46页。

③ 《居易初集》第2卷，光绪辛丑（1901年）仲夏澳门版，第46页。

款项去灾区边放赈边调查灾情，然后根据实际灾情确定赈济范围；募款、司账、押运、放赈都有专人负责；每一灾区均按灾民人数和发放标准拨给款项，并在地方官吏的配合下按规定发放。这种募、收、运、放相分离，定点、定人、定款的赈灾方法，使贪污中饱之事难以发生。而且每月将收解款项逐笔登报公布，每次赈灾结束都刻印征信录，使人一目了然。这与账目不清、贪污挪用成风的官捐局形成鲜明的对照。赈济的对象，已不论地区，只论灾情，哪里灾重就往哪里救灾；赈款的数额也每次多达几十万，在救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83年《申报》曾对经元善等人的义赈活动作过这样的评论：“上海诸善士自六七年前筹办山东旱赈，款巨时长，在事之人无不悉心竭力，所集之款涓滴归公。遂觉自有赈务以来，法良意美，当以此为第一善举……又自有赈以来第一艰巨之任矣。”^①既作了高度的赞扬，又表示了充分的信任。

经元善的义赈活动不限于上海一地，已经扩大到江、浙等东南各省的绅商、官吏及美国、日本的华侨之中。1878年初，苏州著名绅商谢家福主动来函联系联合筹赈；3月，又有扬州著名绅商严佑之来书联系义赈之事。不久，苏州、扬州、镇江、杭州的筹赈公所也相继成立，并均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上海协赈公所的赈捐代收处，除了上海的果育堂、辅元堂、保婴局、保安堂外，还有21处，分设于松江、苏州、金陵、绍兴、宁波、嘉兴、钱塘、慈溪、福州、九江、安庆、汉口、烟台、旧金山、横滨、长崎^②。这样，通过义赈活动，经元善的社会影响已突破上海，向江浙等更为广大的地区扩散。

在义赈活动中，经元善不仅结识了许多声名卓著的绅商，而且有机会与清朝各级官吏接触。与经元善一起组织上海协赈公所的都是上海有名的绅商，各地筹赈公所的组织者也均是一方绅商的领袖人物；各赈捐代收处的主持者，不是地方慈善机构的首董，就是颇具名声的商行钱庄主。其中尤其是上海的郑观应、苏州的谢家福、常州的盛宣怀、无锡的李金镛，不仅是当时名贯一方的大绅商，而且都先后进入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企业，这与经元善后来从事经济和

① 《申报》，1883年8月1日。

② 《申报》，1879年4月8日。

社会改良活动有着重要的关系。经元善和江浙绅商的义赈活动，范围既广，捐款自多。仅至1879年11月止，由上海协赈公所解往直隶、河南、陕西、山西四省灾区的赈款，共计470 763两^①。在两年的时间内募集如此巨款，就是由朝廷派员在上海设立的官捐局，虽以官爵为奖赏，而所得捐款仍不及上海协赈公所。这充分显示了经元善等上海绅商的社会能量，不能不引起各级相关官吏的注目。加之，地处京畿要津的直隶也要依靠上海协赈公所赈济，就更加引起了清廷大员对江浙绅商义赈活动的重视。在办理豫赈时，河南巡抚就表示：“此次民捐助赈事竣，拟即奏请核奖”；江苏巡抚亦向清廷起奏：“江苏民捐助赈，所捐款项暨在事绅董，应俟事竣，由河南查核奖叙。”^② 豫赈结束后河南巡抚随即奏请朝廷嘉奖了义赈有功人员。经元善身为沪上义赈领袖，其功自在首位，虽辞不受奖，亦自明事绩。经元善还于1880年5月亲赴直隶雄县放赈，新认识了当时担任天津海关道员的洋务派官员郑藻如；与当时已出任天津河间兵备道、兼任轮船招商局会办的盛宣怀再度相逢，相交益深；放赈结束时，乘向北洋大臣汇报赈灾事务之机，直接与李鸿章相见。

经元善的义赈活动与一般绅商的义赈活动不同，他不仅从事于收捐放款、设厂赈饥等具体事务，而且注目于兴修水利、根除灾源等长远利益。他亲赴灾区放赈只有直隶雄县一次，时间仅两月左右，但却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对直隶的灾情及其原因作了不少实地考察和访问调查，随即撰文发表，提出了根治直隶水灾的治河代赈说。他认为，直隶连年水灾之症结在于各河流入海口淤塞，造成“入水之处广而出水之处少”，一旦被水，长久不泄，若不导水以畅，则灾无穷时，“赈无了期”^③。他还批评当时官方治水“专务堤工”，名曰“卫民”，实则“害民”，因为掘田筑堤，堤坍入河，河益高而田益低，水性向下焉能不泛滥，如此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永远置人民于水灾之中。因此只有“广开新河，宣泄

① 《申报》，1879年4月8日、12月18日。

② 《申报》，1879年4月8日。

③ 《申报》，1880年6月11日。

积劳，排决归路”^①，才能使河流畅通，河堤永固，水患根除。经元善的这种治灾主张，深得当时有识之士的赞赏。郑观应把经元善所作《畿辅水利专事堤工似利实害说》附录于自己的著作之中，并加按语说：“言皆切实，虑极周详……因其所见相同，附录于此。”^②《申报》则发专文评论经元善的《述北直水利书》，称赞经元善的治河代赈主张是“一劳永逸之谋”^③。就是当时正委任李金镛修筑任丘堤的李鸿章，也不忌经元善对堤工的批评而赞成治河之说，打算“俟各省官捐之钱兴办水利”^④。经元善的治河代赈之说，虽不是什么深奥之论，但他能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切中时弊，实属难得。这既表明经元善好追根寻源、喜调查研究、善分析问题、敢直言不讳的办事才能和性格特点；也反映出经元善在江浙绅商和李鸿章、盛宣怀等清廷官员中的印象，已从社会活动领域而进入到思想理论领域。

直隶放赈回来之后，经元善入上海机器织布局任会办，从此将主要精力投入洋务企业活动，然而义赈不但仍是他一直参与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而且随着洋务企业的发展而迅速扩大。经元善进入上海机器织布局之时，正是洋务企业大发展之际，许多义赈绅商也进入了洋务企业，他们集聚于上海，更使上海的协赈公所成为东南各省绅商义赈活动的领导中心，而且通过洋务企业的分支机构，进一步扩大义赈活动的范围。1883年8月，原办上海筹赈公所、扬镇筹赈公所、苏州筹赈公所同人，联合在上海陈家木桥金州矿务局设立山东赈捐公所，以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为经理人，担任江浙闽粤经募首董的有：唐景星、徐雨之、沈谷成、王锦堂、许仲弢、王介眉、蔡崑青、吴仲耆、张叔和、顾蓉斋、施少钦、曹子搨、袁纯斋、黄仲圃^⑤，几乎囊括了上海的洋务企业重要商董和社会上的著名绅商。其赈捐代收处则多达131处，分布于江、浙、闽、粤、桂、云、贵、皖、赣、湘、鄂、蜀、鲁、辽、

① 《居易初集》第1卷，光绪辛丑（1901年）仲夏澳门版，第11～12页。

②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6页。

③ 《申报》，1880年6月14日。

④ 《申报》，1880年6月11日。

⑤ 《申报》，1883年10月5日。

晋、豫、京、津、香港、台湾及国外的仰光、新加坡、槟榔屿、东京、横滨、神户、长崎、伦敦、华盛顿、柏林^①。其中包括许多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局在国内外的分支机构。由此可见，经元善等江浙义赈领袖进入洋务企业，使原来相对独立的上海、苏浙、扬镇三个协赈公所完全融为一体，从而将这一以上海为中心，以江浙为基础的绅商义赈活动，进一步推广发展，波及大半个中国，并向美、日、南洋和欧洲扩散，形成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义赈活动。

这种组织严密、联系广泛的大规模义赈活动，其意义不仅标志着义赈活动本身的发展，而且反映了早期江浙资产阶级的进步。通过义赈活动，使江浙绅商初步形成了一个社会组织网络，虽然这种网络还不是经济网络，相互之间还没有产生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但是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有一定组织性的社会群体，有可能为达到一项共同的目标而联合奋斗。这种网络虽然在义赈活动中产生，但是它的作用却不仅仅发挥于义赈活动，随着江浙绅商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增加，这一组织网络也被逐渐应用于经济和政治活动，这将从下文经元善的其他活动中略见一斑。这种组织网络与当时的同乡会、行业公所和会馆等绅商社会组织形式相比，其范围更为广泛，已跨越了地区、同乡、行业的界限，但其组织机构的完整性、稳定性和严密性，均不如会馆、公所。因此，从社会群体意义上来说，江浙绅商在义赈活动中形成的这种社会组织联系网络，可以说是早期江浙资产阶级走向联合的第一步。

从1887年到1893年，经元善又接连办理过豫、皖、苏、浙、鲁、奉天、顺直等几次重大的义赈，先后“募款达数百万，传旨嘉奖者十有一次”^②。此时，江浙等省绅商义赈之风气大开，各种筹赈公所相继设立，而经元善则在风气大开之后，考虑到“宇内愿力只有此数，沪上滨海一隅，似不必务名而多树帜”^③，于是抱着人取我弃的思想渐渐退居二线，1894年后则完全退出义赈行列。经元善勇于开风气、求真务实、急流勇退的思想品格，于此可见

① 《申报》，1883年11月14日。

② 吴馨，姚文枬等：《上海县续志》第21卷，《游寓》。

③ 《居易初集》第2卷，光绪辛丑（1901年）仲夏澳门版，第36页。